

见证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诞生

谢明

1949年春天,中央机要处(即中央机要局)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香山地区。此时,中央机要处有不少大龄青年,组织上对他们的个人问题,非常关心。一天,政治协理员廖素华找到机要员韩群,向她推荐副科长徐业夫同志。告诉她,现在革命胜利了,许多早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,年龄都很大了还没有成家,你的年龄也不小了,组织上很关心,希望你能和徐业夫同志组建一个革命家庭。韩群当时感到很突然,没有任何思想准备,未置可否。

韩群与徐业夫同在中央机要处工作,虽然他俩不在一个科,但这位1942年2月入党的冀中女工,对徐业夫的为人和现实表现还是有所了解的。徐业夫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,1930年年仅14岁时,从家乡安徽霍山县参加了工农红军,家境贫苦,又是长征干部、共产党员,工作上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,对党忠心耿耿,延安时期就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,深受毛主席的倚重。

韩群对徐业夫的这些政治条件“一百个满意”,但要和他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一生,韩群还是有点迟疑。按照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对颜值不太满意,徐业夫个子比较高,她个子比较高,觉得站在一起有点不太般配。廖素华大姐了解韩群的心绪后,进一步做她的工作,介绍徐业夫的长处。经过开导,也就打消了韩群的顾虑。后来,年近百岁的时候,韩群回忆这段历史时,无不喜悦地说:“那个年代选择结婚对象,首要的是政治条件,身高长相并不那么重要,只要政治条件好,即使外貌不理想也能接受,如果相貌再好,不是党员也不行。”

1949年4月24日,这是徐业夫和韩群永远记得的日子。这天,廖素华大姐带着韩群,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和徐业夫见面,自此,两位同在机要处工作的同志,第一次以男女朋友相处,彼此的关系进入另一种境界,两个青年人都十分高兴。

那天,见面不久,细心的徐业夫看到,毛主席正在不远处的六角红亭里,聚精会神阅读载有《南京解放》的报纸,这是他们刚刚送给毛主席的。为了不打扰他老人家,徐业夫带着韩群,绕到六角亭池塘对面的山边散步、谈心,可视线不曾离开毛主席。

过了一会儿,他俩偕同毛主席放下报纸,听到他高兴地说:“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,占领了南京,南京解放了!”激动之情溢于言表,旋即坐下,挥毫在宣纸上奋笔疾书。写完后,毛主席又在亭子的围栏上坐了一会,就回办公室了。

毛主席在六角红亭期间,摄影师徐肖冰和侯波一直在那里为毛主席拍照。工作习惯和责任心的缘故,毛主席离开后,徐业夫带着韩群,径直走向六角红亭,侯波很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,大家都是年青人,相互之间非常随意,但那天表现得更加和蔼可亲,他们对徐业夫和韩群的关系进一步发展,感到高兴与祝福。

侯波走到他们面前,毛主席从报纸上看到南京解放了,非常高兴,刚才在亭子里写了一首诗。他们急忙赶到亭子里,想先睹为快,然而,桌面上没有。刚才分明清楚地看到,毛主席是空手返回办公室的,细心的徐业夫从纸篓里找出了毛主席书写的文字,谨慎地展开。此时,毛主席的另一位秘书田家英闻讯也来了。他们看到,毛主席书写的诗,既缺标题,也无落款,但笔走龙蛇,激情澎湃,一气呵成,鲜有改动。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,一起读了起来:钟山风雨起苍黄,百万雄师过大江。虎踞龙盘今胜昔,天翻地覆慨而慷。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。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读完之后,田家英把毛主席手书的墨宝,带回办公室,保存起来。他们为自己有幸亲眼见证这首诗歌的诞生,由衷地感到幸福。兴奋未消,侯波热情地对徐业夫和韩群说:“我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吧。”侯波为他们选了几个景,给这对恋人拍了几张照片,后来,韩群回忆说:“这既是我进北京后第一次拍照片,也是和徐业夫共同拍的第一张照片,还是摄影大师侯波第一次为我们拍照,非常的珍贵。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,眼前就浮现出那天情景,至今令我记忆犹新,终身难忘。”这次俩人的匆匆见面,确定了他们的恋爱关系,并于当年11月7日喜结连理。

关于这首诗的诞生过程,在《毛泽东年谱(第3卷)》和田家英、韩群的回忆文章中均有记述。

时光荏苒,1963年,古稀之年的毛泽东要为自己的诗词创作作一个总结。他让田家英以1958年出版的《毛泽东诗词十九首》为基础,加上此后陆续发表的诗词,重新集结出版。在诗集定稿发排之际,田家英想起,14年前毛主席扔进纸篓的那首诗稿,随即向田家英汇报,完毕,田家英将记录稿及所附短信一并交给毛主席。毛主席看后想了起来,“忘了,还有这一首。”随手在记录稿上将“苍皇”改为“苍黄”,并定下标题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,批示给田家英同意入集。1964年1月1日,《毛主席诗词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,共收入毛主席诗词37首,其中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第一次公开发表。

在围歼黄维兵团中瓦解敌二十三师(下)

十九师研究决定,由五十六团雷团长、黄政委代表师复信黄子华,答复他:当日晚,必须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集合;解放军保证全体官兵生命安全;投诚官兵当解放军与要求回家,由本人自愿。

双方还谈了受降时具体行动方案:双方朝天开枪开炮,以示经激战后被歼,以迷惑敌兵团部。

投诚条件和初步的行动方案,黄子华是接受的。但事到临头,黄子华还是犹豫不定,他还有顾虑,要求再给他时间。十九师考虑,要不要再给他一些时间。

为了探虚实,做好万无一失,不成转入攻击的准备,十九师一方面派五十六团作战参谋胡晓初随敌进庄观察敌情,另一方面调整部署,将攻击部队隐蔽逼近庄前。同一天,师部又派政治部主任王荣光前往五十六团协调谈判之事。

王荣光到达五十六团时,恰逢上级规定的攻击时间已到,只见五十六团团长雷伟和正在电话中极力要求师部“请示上级延缓攻击时间,以争取谈判成功”。结果师里不同意,并催催五十六团马上发起攻击。团政委黄炳光在一旁也是一脸疲惫。

王荣光了解情况后,认为敌有谈判投降的诚意,也要求师建议上级延迟30分钟攻击,以等候敌人正式答复。师长熊应堂、师政委萧学林在电话里询问:继续与敌谈判,有无把握谈成?王荣光回答:第一,敌师长黄子华已准备与我用单机架通电话通话,他还是想继续与我谈,但有顾虑,我们在谈判时可以消除他的顾虑。第二,我方已向敌师长黄子华表明“如继续顽抗,你本人必须对其被歼负完全责任!”黄听后显得惊慌起来,他有动摇。第三,黄子华已派人出来谈具体方案,一再向我方表示给他时间,他是怕白天行动会引起敌兵团部警觉,要求我方停止攻击。第四,从几次与他接触的情况看,黄没有食言,还是能遵守对我们的承诺的。我们也承诺给他一点时间安排考虑,现在应该让他看到我们是守信的。随即,师里研究后,同意延缓攻击时间。

当日黄昏,黄子华派师部人员随我方胡晓初参谋回来,王荣光即询问胡参谋,通过他了解许多敌方情况,还通过随他而来的几个敌师部参谋了解敌方情况。通过较全面的了解,王荣光分析判断敌确有投降诚意。

两天来,雷团长、黄政委经历了与敌谈判全过程,眼看着敌人可能就要投降,但上级已经延缓攻击的30分钟就要过去了。怎么办?怎么办?敌人依仗着天然水沟作为屏障,阻挡着我军进攻,由于缺少重炮,部队继续攻击肯定伤亡不小。这时,熊师长、黄政委等师首长都在焦急地等待谈判的结果,师里的电话不断打来五十六团,了解谈判进程,并告知:上级规定的攻击时间不能因为谈判而拖延,与敌谈判可能就要到此为止。

此处的团指隐蔽部里,异常安静。大家都在思考,都在着急。烟,一根接着一根抽,没有时间作过多的考虑了,现在需要立即作出决断!

王荣光作为师里派来的谈判代表,他意识到应该马上拿出正确的判断供上级参考。他与五十六团综合分析了敌诚心投降的五大征兆,又拿起电话,向师建议上级继续延迟对敌攻击时间。他们的判断是:第一,敌已领着我方代表胡参谋比较仔细地看了他们的阵地工事,说明他们做好了撤出后向我移交阵地的准备,否则不会这么做。第二,敌人正在收集捆扎武器装备,许多士兵在整理背包,敌后勤人员正在集中,伤病官兵正在转运,敌已准备出庄散在后方汉口的官兵家眷和留守人员。第三,敌已秘密地在营以上军官中布置向我投降的行动路线及方案,敌已对少数不可靠军官执行了监视和扣押。第四,敌师长黄子华已派人送来他随身佩带的手枪、望远镜和手表,表示真心投降的诚意。第五,敌人对阵地作了重新部署,目的是针对十八军,敌一部已对村庄西北面敌十八军的一个营放了警戒。

与此同时,五十六团再次安排人员进入小王庄,催促敌迅速缴械撤出,并给敌方规定了撤出信号、次序、集中地点等具体事宜。

在紧张的等待中,王荣光在五十六团密切注意敌人动向。从我们派去的人返回的汇报看,黄子华的确也动了起来,他派来的人与我军引导下走了,他们对阵地作了重新布置,破坏了与敌通讯联络。黄子华那在做投诚的准备,雷伟和这边作好了接收投诚的准备工作。五十六团分头仔细检查了执行的情况,保证各部门都不会出现意外,也安排了出现意外情况时的补救措施,然后,就是继续等待着。这时的等待,显得相当漫长。

等啊,等啊,已经四个小时过去了。大约晚9时半,对方发出了事前约定的撤出信号。接着,黄子华亲自率部陆续撤出,脱离敌方阵地,向我方指定地点集中。前阵地打电话报告:“黄子华的部队过来了。”

敌黄子华的部队终于被拉出来了!王荣光立刻打电话,向师里报告这一好消息。

敌二十三师或迫敌向我投降,将会直接对我二十师夺取大王庄以有力支持。尽管责任重大,王荣光、雷伟和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。很快,经师里请示纵队得到批准,同意继续延缓攻击,与敌谈判,促敌尽快投降。

天色就要黑了,五十六团没有等待,也不能等待了,马上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。团长雷伟和以师参谋长名义,通过架通的单机,把电话直接打到了敌师部,呼喊黄子华接电话。黄子华毫无思想准备,十分惊慌,好一会儿才抖抖索索接过电话。雷伟和斩钉截铁地说:“今日天色一黑,就请黄师长立即行动。届时,我军将猛烈炮击小王庄和双堆集之间的地带,掩护配合。”

黄子华当然明白,如果他变卦,解放军的炮火随时可以缩短射程。他没有立即回话,隔了一会儿,恳求似地说:“请留给我们对部队做工作的时间。同时天不黑调动部队,容易被那边发现。请贵军推迟4个小时,我们下半夜行动。”雷伟和向黄子华传达了七纵十九师作最后一次让步的意见。

与此同时,五十六团再次安排人员进入小王庄,催促敌迅速缴械撤出,并给敌方规定了撤出信号、次序、集中地点等具体事宜。

在紧张的等待中,王荣光在五十六团密切注意敌人动向。从我们派去的人返回的汇报看,黄子华的确也动了起来,他派来的人与我军引导下走了,他们对阵地作了重新布置,破坏了与敌通讯联络。

黄子华那在做投诚的准备,雷伟和这边作好了接收投诚的准备工作。五十六团分头仔细检查了执行的情况,保证各部门都不会出现意外,也安排了出现意外情况时的补救措施,然后,就是继续等待着。这时的等待,显得相当漫长。

等啊,等啊,已经四个小时过去了。大约晚9时半,对方发出了事前约定的撤出信号。接着,黄子华亲自率部陆续撤出,脱离敌方阵地,向我方指定地点集中。前阵地打电话报告:“黄子华的部队过来了。”

敌黄子华的部队终于被拉出来了!王荣光立刻打电话,向师里报告这一好消息。

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二十一

(张正耀 编著)

红28军春节智擒余道密

梁远启

1935年2月12日(农历正月初八),第三次组建的红28军,在潜山县智擒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财政厅厅长、恶霸地主余道密。这一行动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,大大鼓舞了革命群众坚持游击斗争的勇气。

倒行逆施引愤慨

余道密,又名余咏南,安徽省潜山县官庄林家冲人,1873年7月生于一户大地主家庭,1897年考中拔贡,1922年任安徽省政务厅厅长兼芜湖道道尹(1926年冬曾代理过安徽省政府主席),1928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。

余道密走上仕途特别是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当上要职后,便利用职权,贪污受贿,广置田产,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剥削。他每年收租1000多担,逢年过节佃户还得请客送礼,家中常年雇用长工,女佣十几人,生活极其奢侈。

1930年后,皖西地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,声势日益浩大。面对革命烈火的燎原之势,余道密深感忧虑。他一方面购买枪支弹药,一方面冒险回县组织团防,命次子余周觉担任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,其弟余道寅担任联防队官庄团练头子。他们带领反动武装,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,向我根据地进攻,疯狂屠杀革命群众。他们叫嚷“芭茅过火,石头过刀”,要把红军斩尽杀绝。在余道密唆使下,余道寅、余周觉一伙为非作歹,横行乡里,处处与红军为敌,引起极大民愤。1931年,余周觉捉到一名红军战士,在施以坐老虎凳、灌辣椒水等酷刑后,将红军战士活埋。还有一次,余家抓来十多名红军战士,余周觉、余道寅亲手杀害5名。余道密一伙的反革命罪恶行径,令广大群众十分愤慨,也引起红军的密切关注,决定寻机予以狠狠打击。

1934年11月,红25军主力长征西去,留下的部分兵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游击战争。余道密认为鄂豫皖红军已“消灭干净”,可以安稳过年过节,“光宗耀祖”。1935年1月底(农历除夕前夕),他在一连兵护送下,坐着大轿,由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回潜山老家过年。到留下他时他还特地下车,步行回家,留下“敦朴谦逊”和“尊重乡里”的假象。但是,奸伪狡诈的余道密,深知自己作恶多端,时刻担心狗命,因此,对警卫工作作了周密布置,自以为万无一失。

尽管如此,余道密还是提心吊胆。因此,回家没呆几天,便要返回安庆,但在母亲一再挽留下,勉强答应过完元宵节后再走。

周密布置擒恶霸

1935年2月3日,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(今岳西县境)召开会议,第三次组建

红28军。当得悉余道密回家过年的消息后,红28军决定抓住机会,活捉余道密。

在摸清情况后,2月9日(正月初六),红军开始行动。参加行动的包括红28军特务营三个连和手枪团一、二分队,共300余人,在红28军军部秘书胡继亭和特务营营长林维先的率领下,于2月10日(正月初七)到达岳西县磬落坪。2月11日(正月初八),胡继亭、林维先主持召开会议,研究布置活捉余道密,确定由蒋同学等人组成便衣队混入余道密住宅,和主力部队里应外合,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。

2月11日(正月初八)下午16时,红军从磬落坪动身,经过一夜急行军,步行100多里,赶在2月12日(正月初九)天亮前到达潜山县官庄。

虽然红军严格做好保密工作,但行迹还是被人发现,有人向余道密通风报信,让余道密尽快离开,返回省城安庆。余道密听到消息后虽然吃惊,但碍于身份,还是故作镇静,给部下打气,说鄂豫皖红军早就被杀光了,不要大惊小怪。他想,即使红军来了,也只是少数游击队,不用担心。因为此前国民党部队在此修筑的3个碉堡尚在,自己又带有一个连的兵力,十几挺机枪,子弹充足,少数游击队,几条破枪,能耐我何?

2月12日(正月初九)拂晓,蒋同学等四人头戴礼帽,身穿长衫,手提礼品,化妆成拜年客,来到余家密家门口,骗过岗哨,大摇大摆地进了余家大门。他们进去后便问余家佣人:“余老翁在家吗?我们来拜年。”佣人回答说:“余老翁还未起床。”四人相互递个眼色,迅速进入余的卧室,马上将房门关上。正在酣睡的余道密听到响声,顿被惊醒,还没来得及反抗,便被从床上拖了下来,蒋同学同时鸣枪发出信号。

埋伏在余家附近的红军听到枪声,立即翻越院墙,涌入余宅。余道密做梦也没有想到,红军居然从天而降,站在自己的面前,堂堂的省政府委员、财政厅厅长,顿时吓得象一堆烂肉瘫软在地。这时,住在另一间屋里的余周觉发现了红军,正要开枪,却被其妻一把抱住,哀求他不要开枪,保护要紧。余周觉冲出门外,准备跑到碉堡里顽抗,但没跑几步便被活捉。其余随从人员及家眷等早已举手缴械,跪地求饶。

就这样,红军没费多大力气,便生擒了余道密,同时还抓住了正在余家拜年的十多个土豪劣绅,算是意外收获。

新春除恶快人心

余道密被红军生擒,引起国民党上下极大震动,急忙组织救援。2月13日(正月初十)上午八时左右,国民党25路军约1000余人闻讯赶来救援,但余道密早已被红军擒走,他们便寻踪追击,沿途用机枪、步枪疯狂射击。当时红军正在石狮塘(又称簸箕台)休息,察觉国民党部队迫来,立即准备转移。老奸巨猾的余道密听到枪声,料定救兵赶到,便死死地躺在地上不走。看到罪大恶极的余道密顽固不化,红军果断作出决定,将其就地处决,同时还处决了在余家捉住的劣绅余顺三、余松青等人。

2月14日(正月十一)清晨,红军转移到舒城县小涧冲,又将余道密次子余周觉和土豪余一梅等处决,同时将所获的一干人犯分别处理。随后,返回游击根据地。

2月15日,余道密在安庆的长子余周洁,在芜湖的三子余佩华得知父亲被俘的消息,他们一面向国民党中央参议院长陈调元发去电报求救,一面星夜赶回。陈调元闻讯后,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官庄山区低空盘旋,妄图寻找,但早已无济于事。可笑余道密,自以为措施周密,却最终难逃恢恢法网。

余道密、余周觉和一批土豪劣绅被红军处决后,侥幸漏网的土豪劣绅们惶惶不可终日,纷纷外逃,留在家中的,对我军民迫害也不得不有所收敛。随即,红军与尾追之敌在潜山、岳西、舒城三县交界处展开激战,将追兵击溃,获得胜利。

抗日烽火

抗日期间,日军曾两次侵犯叶家集,所到之处,实行“三光”政策,生灵涂炭,国破家亡。

第一次,日军侵犯武汉,1938年9月2日,在叶家集盘踞43天。国民党军在叶家集史河西岸河南团始富金山顽强阻击,歼敌4000多人,延缓了日军攻击武汉时间,保障国府向重庆转移。

第二次,1942年12月31日,日军从武汉窜出扫荡安徽省府驻地金家寨后,经杨家滩,于1943年元月3日过叶家集,龟缩信阳。一路烧杀,制造了茅坪惨案,杨家滩轰炸,血战青山。国民党腐败无能,日寇一路无人之地。

日寇侵犯叶集,烧我房屋,残害我兄弟姐妹,我同胞,无恶不作,在党组织领导下,军民奋起反击。

叶集在李耕野、赵善甫领导下,成立了叶集抗日第四支队,李耕野任队长,赵善甫任指导员,开展斗争。于1938年8、9月间,两次切断六安至叶家集、姚李庙至七里棚段公路,切断日军电话线,破坏通信联络。一次日军一个班7个日本兵到乡下抓鸡,遭到伏击,6个日寇当场毙命。另一个拼命逃窜,半路被台家汪杨德智壮士迎面一扁担当头击毙。1938年10月28日夜,李耕野、赵善甫、王捷山(副队长)率领队员36人,奔袭日军营房,日军正在酣睡,游击队员抹去哨兵鞋子,冲进营房一阵猛烈射击,日军顿时乱作一团,哇哇惨叫,待缓过劲来,游击队已在黑暗中消失,这次奔袭毙伤日军32人,缴获“三八”大盖10支,从此,日军少数人不敢下乡。日军从叶家集撤退时,进行疯狂报复,日军把没逃的老弱妇孺80多人,集中在叶家集北胡芦塘,集体枪杀,镇里镇外,放火烧房4000多间,到处火光冲天,到处是焦土灰砾,叶集人民经受了国破家亡、血与火的灾难。

叶家集沦陷之后,有不少儿童流浪武汉,被当时驻武汉国民党政治部三厅保育院作为难民收容,后来有的从这里参加革命,如台草群、杜宝镜等。

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,叶家集虽无战事,但日军飞机



叶集新貌 (徐名朝) 摄

叶家集解放前后(中)

周启仁

常来轰炸。一次上午十点左右,日军飞机来叶家集,父亲带着我跑到街后一座大土井边躲避,好似敌机追着我们,我们在井里丢下炸弹,幸亏我们在井外埂边趴着,挡住冲击力,有惊无险。幸有一天晚上,父亲从外面匆匆回来,把油灯吹灭,说有敌机来,我跑到院里,仰望天空,满天繁星,只见几个红点一闪一闪,第二天街坊里传出,有一架飞机落在大河滩上,我们小朋友去看稀奇,以后知道这是苏联援华参加武汉空战飞机,被敌机击落在这里,三名飞行员备有以待,赵善甫闻讯,用俄语与之沟通以后,方知道了后方,在赵善甫的引导下,飞行员安全归队。

抗日时期,叶集也算上大后方,安徽省府迁到大别山腹地金家寨,是省府人员进出必经之地。抗日时期一度出现短暂的繁荣,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原说是五里长街,后来南街的空店子接上,实际有五里长街,分为北大街、十字街、中大街、南大街,政务设在北大街,南街是穷人街,中间是商业街。十字街是繁华的市面,人流交汇中心,各种小卖铺遍布于市,是南来北往的人因店街中心,早市人流拥挤,水泻不通,晚市灯火通明,热闹非凡。

十字街西边的汽车桥下河底部,有个露天市场,也是当年最热闹地方,小河没汛时,天刚放亮,半里多长的河底里,便活跃起来,山里的山货、木材、竹子、大柴、湾里的蔬菜,以及编织物、陶器等,还有一些民间卖艺的,如推洋片的,玩大把戏的,套圈的,说大鼓书的,民间文化在这里表演,更添一份热闹。

当年街上,什么麻行、茶行、树行、纸行、药草行、盐行以及米坊、手工坊、银铺、铁匠铺、中药店、黄烟、酿酒、绸庄、布店、食品、什货、饭店等百姓生活用品商店,琳琅满目。

当时叶家集在册商号有好几百家。有名的有江义隆、齐茂,还有大家引誉的“未名四杰”,台静农在南大街商号为“台裕大”、李霁野和韦家住在北街,商号为“李锦源”、“韦合兴”。当时贸易主要是大米、茶、麻、药材、桐油、蚕丝、木材、竹子等,进来的主要是食盐、布匹、洋油、颜料、绸缎、火柴、肥皂等生活用品。这些有名商号都与官方有联系。

因此,叶家集的物流、资金流、人流,特别忙碌,促进了叶集繁荣。

叶家集人口稠密,特别是史河湾,人称沙淤地,盛产大麻、萝卜、大白菜,山羊、河鱼比较出名,当时誉为大麻之乡,青头萝卜胜似羊脂,水份大,清脆,名享一方。由于叶集商业繁荣,文化也很发达,记忆中还有三所完全小学,抗日时期,一度有省府迁到叶集,后又迁到三元,一直到李家北圩。抗日胜利后,有当地名流组建明强私立中学一所,仅办二年,解放时停办。还有书店、邮局、京剧团。街上文化名人,除了“未名社”“四杰”外,北大街有个清末秀才盛梓仁,曾为湖南督军张敬尧幕僚,北大街有个台介人,南湾有杜尧階,曾任邵阳县财政委主任,还有陈席伯当过霍邱县中学校长,这些人都是名贵一方的。

在这块地方住有两大姓,一是台姓,二是李姓,都是大户人家,都有头面人物在外为官。李姓在河南省有人干民政厅长,台姓有人干团长、县长。有个台凌一任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中将参议驻南京政府代表。这两姓实际掌控叶集政治经济。

国民党在叶集统治严密,设有叶集区公所、叶集镇公所,下有保、甲制度,并设有警察分局。有一年,迁到叶集的第第九届中学生看戏,被警察打了,惹火了学生,起哄砸了警察局,学生还动了枪,吓得警察钻桌肚。从此当局把学校又下迁到乡下的三元店觉林寺。

上面讲的扭曲的行政区划,可给穷人带来好处,两省隔进一步之遥,河南有人事跑到安徽来,叶集有人难跑到河南避难,这种情况直到解放后1950年才解决。



本栏责任编辑:谢菊莲 E-mail:46743672@qq.com